对一场以叶嘉莹先生别号“迦陵”命名的诗教活动观察——

他们用AI短片传递古诗词的薪火

羊城晚报记者 熊安娜

11月12日,“迦陵薪火·数创诗心”——2026“迦陵杯·中华诗教大会”粤港澳大湾区分区创作交流分享会在暨南大学华文学院举行。

“迦陵杯·中华诗教大会”2024年创立,以古典诗词学者叶嘉莹的别号“迦陵”命名,旨在传承其诗教精神,让更多人亲近古典诗词、读懂中华经典。今年,大会首次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分区。

分享会上,暨南大学、汕头大学的师生团队带来用AI制作的古典诗词短片,结合现场展映,分享文本解读、剧本构思与视频制作的过程。港澳地区的“迦陵杯”组织代表、广州多所中学的教师代表等也来到现场,一同探讨AI时代的诗歌教育。



创作交流分享会现场 许捷 摄

数字工具如何帮助学生读懂古代文学?

“我一生以教书为事业,想把古人诗词中的美好传给年轻人。”2023年,叶嘉莹先生在南开大学举行的中华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这样谈起自己一生所致力的事业。当年轻人习惯通过短视频认识世界,那些千年前的诗句,该如何与他们相遇?2024年7月6日,农历百岁生日这天,叶嘉莹先生亲自宣布启动首届“迦陵杯·中华诗教大会”古典诗词讲解短视频征集活动。

拍完叶嘉莹先生的纪录片《掬水月在手》后,联合制片人徐薇和同伴一直在尝试用不同的影像形式推广古典诗词。导演陈传兴曾把短视频比作这个时代的“绝句”,这句话启发了她。从文字走到影像,徐薇花了很长时间。面对AI带来的变化,她坦言自己也有些胆怯。直到在交流会上看见学生讲起怎样读诗、写剧本,又怎样把构思变成画面,她说:“我感到被鼓励到了。”

——南宋绍兴十年(1140年),鄂城大捷后,朝廷连发十二道金牌,催岳飞班师回朝。眼前是尚未击退的金兵,身后是一路征战的将士、渴盼重归家园的百姓。当军令到达帐中,岳飞会是怎样的神情?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满江红》里的愤懑,读来字字分明。及至镜头对准岳飞,那张被火光映照的脸上,是怒形于色,还是一言不发?制作AI短片《满江红》时,暨南大学华文学院2025级本科生李冰萱和她的创作小组,就遇到了这道难题。

雨水沿着屋檐滴落。年迈的“阿顺”听着雨声,恍惚又回到接到军令的那个夜晚。李冰萱在汇报中分享道,她们在短片中虚构了一名传令亲兵阿顺,透过他的眼睛去看岳飞沉默面容下压抑着的家国深恨。

——《会当》铺展的则是杜甫一生的行迹。一卷书翻开,泰山、华山、衡山次第入画。汕头大学文学院本科生创作的AI短片《会当》里,国风动漫中的少年在不同时期与杜甫相遇。青年时的登临意气、仕途受挫后的苦闷、晚年漂泊中的家国之思……黑白水墨间山色几度变换,诗人三次望岳时心境也随之转深。

“诗词是生命的感发。”展演结束后,汕头大学文学院讲师林晓娜借叶嘉莹先生之语点评道。“在同学们的作品中,循着画面与声音,我们能感受《满江红》的慷慨悲壮、杜甫《望岳》中的家国之思,也能遇见春风里的桃花、深巷里的杏花,还能与白居易的‘新酷’、杜甫的‘旧酷’共同举杯。”

汕头大学学生作品《会当》就出自《杜甫研究》课堂。指导老师林晓娜依托汕头大学文学院诗心词韵工作室,将唐宋文学编年地图、知识图谱等数字工具引入教学;学生循着地图梳理杜甫的行迹,把三首《望岳》放回各自的写作处境,再借助AI打磨剧本、生成画面。“我希望以这门课为起点,继续探索数字工具如何帮助学生读懂古代文学。”林晓娜说。

教学指导贯穿影像生成全过程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分区创作交流分享会的主持人,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春晓自2025年起,便将AI短片创作引入古典诗词教学课堂。

这场教学尝试,缘起于她批改作业时遇到的难题:“AI已经席卷我们的学习与生活,学生早已习惯借助AI完成作业。我评判课程作业时常常感到为难,很难分辨其中有多少内容出自AI之手。”恰在此时,2025“迦陵杯·中华诗教大会”古典诗词短视频征集启动,一个想法在她心中成形:“既然避不开AI,不如索性以AI为工具,引导学生把阅读诗词时体悟到的诗意,转化为可以用视频讲述的故事。”

首轮课程结束后,有学生在心得里写道:“万万没想到,老师居然允许我们在做作业时使用AI。”更多学生实操后则发现,AI远没有预想中得心应手——想让AI准确呈现自己在诗词中体悟到的意境与诗意,不仅要自己先理解,还得把它梳理清晰、表达明白。

2025“迦陵杯·中华诗教大会”优秀作品、由张春晓师生团队制作的《蝉蜕诗案》,正是这一教学思路的典型样本。一枚蝉蜕、数行残诗,如何牵出长安废宅中的一桩疑案?AI短片《蝉蜕诗案》以骆宾王《在狱咏蝉》为叙事主线,虚构了狄仁杰凭蝉蜕、残诗等疑点抽丝剥茧,揭露王弘义毒杀嫁祸的阴谋,骆宾王以诗为刃传递真相的故事。

《蝉蜕诗案》作品主创、暨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生郭越、贺瑞琳向记者分享道,AI拓宽了古典诗词的影像表达空间,而剧本创作的难点在于创意,在于如何将《在狱咏蝉》中沉郁的情志融入悬疑叙事。进入AI视频制作阶段,难题也接踵而至:同一个人物切换镜头,容貌常会发生偏移,神态、动作也容易失真。团队慢慢摸索出应对办法:先绘制人物三视图,锁定统一形象再由图生成视频;遇到口型与台词不匹配、局部画面难以修正等问题,则通过剪辑调整镜头的取舍与衔接。

首轮课程后,张春晓相应地调整教学策略。2026年1月,她主持的《AI赋能·过程引导:古典诗词视频创作驱动下的古代文学教学改革与实践》获批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研究和改革项目;同年7月,暨南大学AIGC诗词视频工作坊正式设立。张春晓将诗词短片创作纳入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任务,教学指导贯穿选题立意、文本细读、剧本打磨到影像生成的全过程。古代文学课堂上,近百名学生先提交创意初稿,她从中遴选富有叙事张力、能够挖掘诗词当代意蕴的构思。随后,由学生执笔创作原创剧本,课程助教与学生们一同打磨视频产品。

“AI只是一个工具,最核心的还是人本身,包括对诗词的理解和情感。”张春晓说。

短视频是这个时代的“绝句”

记者在分享会现场了解到,不少展演作品的制作开支在百元以内。第一部短片做完,陈思宇很快又着手尝试第二部,这回她把故事放到了未来,设想人与机器共存时会怎样争夺地球资源。“AI让我的创意以学生也能负担得起的成本得以实现,它是我的好朋友。”说到这里,她笑了。

今年,“迦陵杯·中华诗教大会”首次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分区,为三地诗教实践搭建起交流平台。香港活动组织者张聪介绍,当地高校和中小学正在筹备诗词影像创作,选题包括辛弃疾的《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李白的《望天门山》等。澳门活动组织者则提出,希望依托澳门本土艺术节的平台,邀请大湾区师生集中展播作品、分享创作心得,展开交流对话。

湾区之外,AI也进入了全国高校诗歌教学的不同环节。上海大学文学院开设通识选修课《当AI遇见古诗词:人工智能与古典诗词创作》,将平仄、用韵、对仗、用典与AI辅助创作结合起来。由中国韵文学会、中华诗歌研究院等单位主办的2025首届全国AI诗词可视化大赛,以“杜甫与成都”为题,面向高校学生征集影像作品。今年,四川大学文学院等单位主办的第二届大赛特设东坡文化AI短视频专项赛,并在川大举办工作坊。赛事组委会主席王兆鹏从苏词名篇讲起,与影视领域教师共同点评参赛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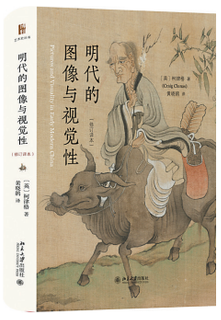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语言,古典诗词也在与新的表达方式相遇。将AI引入课堂,并非人文向技术低头、为技术“赋魅”,而是通过使用与辨析,为技术“祛魅”。画面可以迅速生成,诗意却需要细细体认;技术越能代劳,越需要学生明白,哪些选择必须出于自己的理解,哪些判断需要回到文本中求证。

诗教也由此多了一层当代意义——在答案越来越容易获得的时代,涵养感受的能力,保持追问的耐心。变的是工具,不变的是诗教对心灵的滋养,是一颗心对另一颗心的感发。经典的薪火,正是在这样的理解与感发中传递。

出版书单

《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

□柯律格[英] 著



该书对明代中国(1368–1644)的视觉文化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打破了以往将中国艺术史局限于“文人绘画”这一精英范畴的传统,转而考察一个更为广阔且丰富的图像世界。

《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

□陈平原 著



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在硝烟中开启了内迁、浴火重生的历程。本书聚焦这段“弦歌不辍”的历史,以西南联大等校为核心,通过对档案、日记、书信等史料的深度挖掘,还原了中国大学在生死存亡之际保存学术实力、赓续文化命脉的真实场景。

《国风(元明清)》

□王彦章 著



从元明清三代深刻的突变性、强烈的融合性、浓郁的近代性出发,描绘了不同于其他朝代的独特的新鲜的风尚。从胡化、辫发、宴飨、园林、元曲、杂剧、传奇、八股、小说、婚俗、厚葬、敬神、结社、文狱、海禁、八旗、洋务等方方面面写起,历史风尚画卷熠熠生辉。

《艺术史中的非典型美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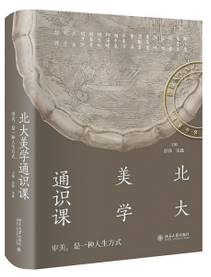
□周宪 著



本书聚焦西方五百年艺术史中十位“非典型”艺术家,包括乔尔乔内、勃鲁盖尔、普桑、维米尔、大卫、弗里德里希、蒙克、埃舍尔等,通过细腻的笔触,解读每位艺术家的话语及其艺术作品的精微细节,由此展开发散思维式的美学漫步,揭橥了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艺术及美学观念的演变历史。

《北大美学通识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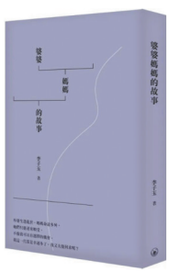
□彭锋 宋鑫 主编



十七位名家,汇聚于北大美学通识课的课堂上,从艺术、文学、历史、哲学、考古等多维视角出发,针对当代人的精神困境,娓娓道来。

香江 □罗靓

子玉那些“婆婆妈妈的故事”



读李子玉2023年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婆婆妈妈的故事》让我想起自己在肯塔基大学上的第一堂英文创意写作课。或许是因为主题和创作时机的深度契合,子玉的《婆婆妈妈的故事》相较于其他著作,更让我动容,也更能让我感同身受。这里的“婆婆妈妈”自然是可以从多重意义上来感受的。我喜欢读这样有烟火人间气息的文字是因为我的外婆和子玉的外婆一样目不识丁,甚至一辈子只会说方言。子玉的书正是从外婆写到妈妈,再写到“我的故事”,娓娓道来三代香港女性之间的深情与疏离、爱意与纠葛。

开篇《外婆的身世》以舒缓的对话体呈现。子玉的外婆出生于1909年,比我的外婆大了二十岁,而子玉和我的年龄差应该也接近二十。尽管如此,我却能从子玉对外婆充满情感的文字中读到自己外婆的影子。我尤爱读子玉写食物的文字,“红烧元蹄炆大白菜”的做法,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外婆北方童年生活的想象。然而现实中的外婆“从来不给我们烧这些菜,只会煮口味清淡的广东菜”。外婆完全忘了出生地的天津话而只会说广东话,或许也是现实需要超越了任何怀旧空间的呈现。

子玉写到1958年夏天从广州到澳门,半年之后再辗转香港的儿时经历,也让我颇为动容。对我而言,尤为珍贵的是子玉文字中对当时流行粤语片的描述,从中我们得以窥见任剑辉、白雪仙、芳艳芬等明星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苹果的滋味》一节,子玉借外婆买苹果给自己初次品尝的经历,赋予了苹果以承载对外婆思念的深意,颇有普鲁斯特《追忆似水流年》的韵味。

如神来之笔,子玉通过《梦见妈妈》一节点出与母亲之间尤为复杂的情感联系。在梦中妈妈变成了婴儿,张着嘴巴要子玉喂奶。如同而今每天吃到苹果仍会想到外婆一样,子玉每逢经过母亲多年前住过的佐敦道华丰大厦附近的地铁站时,总是久久不能平静。妈妈早年的失败婚姻和她后来在舞厅伴舞、嫁给大户人家公子、伴夫留学伦敦的“仙履奇缘”似传奇人生,都通过子玉的视角似乎云淡风轻却又入木三分地白描出来。

子玉在“我的故事”中首先呈现的是通过哥哥观察到的世界,包括和哥哥看战争片、怪兽片、武打片的情形,与和外婆所看粤语戏曲片相映成趣。此外,子玉在浸会学院中文系的生涯读来也很是亲切,虽然自称不是一个好学生,子玉和徐吁的师生情,以及由此激发的与现代文学的渊源,都让人印象深刻。

子玉在芝加哥陪表哥读博士的十年,虽然在“我的故事”中所占篇幅不算大,却留下了颇为重要的烙印。子玉称它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日子”,认为自己“在那里学懂如何做个坚强的女人”。

“婆婆妈妈的故事”以子玉“给老公的信”作结。这是子玉于2022年十月十七日到十月十九日之间写给丈夫欧梵的八封信,字里行间都浸润了子玉与欧梵之间的深切情愫与相互依恋、相互扶持的绵长心意。作为见证了子玉与欧梵师二十余年相濡以沫的晚辈,同时作为开始尝试中英文创意写作的学生,阅读此书的过程实在是一次心灵奇旅。

子玉真诚赤裸的文字,承载着个体生命体验的厚重与温暖,作为读者与共情者,我在其中找到自己,在回味中丰富自己。

本土 □李红霞

潮汕读物如何走进海外家庭日常?



对于远在东南亚、欧美的潮汕籍侨胞来说,翻开《走进阿嬤的潮汕》,熟悉的潮语童谣响起,便是记忆里阿嬤的声音。广东教育出版社推出的《走进阿嬤的潮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观察的样本。

该书并非简单转述二手材料,而是依托原始侨批文献重新梳理,把泛黄纸页里的牵挂与思念,转化为温润可读的日常叙事。身在海外的潮汕后裔,不必踏入档案馆,在自家书桌前便能读懂祖辈下南洋的艰难历史与无尽乡愁。扎实严谨的学术底色,是侨乡文化走向大众的前提:乡土记忆不是陈列的展品,而是要让沉淀的历史自己说话。

面向华裔新生代,文化传播最大的难点,不在于缺少内容,而在于内容能不能融入日常。成长在异国环境里的侨二代、侨三代,少有机会回到祖籍地沉浸式感受乡土文化,宏大宣讲、短期寻根营带来的触动,往往难以长久留存。即便是纸质好书,如果束之高阁,也会被慢慢淡忘。这本书的融合出版探索给出了新思路:搭配方言诵读音频,把静态文字变成可随时播放的声音档案。听音频不必正襟危坐,通勤路上、厨房劳作、睡前闲暇,都可以听见乡音。正因如此,不少侨胞把它当作潮语启蒙读本,海外侨社也将书中童谣引入潮语学堂。

文化产品能不能走出去,不取决于推介力度,而取决于它是否轻便、是否适合流转、是否让人愿意主动转赠。这本书走向海外的路径,正是这一逻辑的印证:它先在“潮侨聚故里”活动中作为给海外侨胞的“文化信物”,随后在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地被侨胞自发购书互赠、在侨社分享传阅,并获当地主流华文媒体关注。从官方推介到民间口碑,传播链条在海外侨胞的主动参与中自然延伸。

一本潮汕读物的走红启示我们:文化润侨,不在于声势浩大的活动,而在于一套可持续、有温度、接地气的侨乡文化供给。

观剧 □吕珍珍

“神探”坚守竟然无答案



在看电影《神探之痕迹》的过程中,我始终在寻找一个答案:主人公崔寻在刑侦领域坚守数十年的精神动力,到底是什么?观众在对案件本身的好奇之外,期待看到主人公更丰富的精神世界,读懂支撑他做出不凡成就的内在力量。

性格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无论是两次开创先例,把齿痕和指甲作为同一认定的物证用于案件侦破,还是从241袋被炸物品残渣中提取出死者的身份证,以此为突破口确认凶犯身份,崔寻都表现出极致的冷静严谨和求真务实,坚持“物证至上”。但这是人们对刑侦人员的普遍印象,或者说是这个职业的要求使然,不独属于“崔寻”这个人物。

看得出,影片也试图挖掘这份坚守的源头,但回答难以令人满意。崔寻忙于工作无法照顾家庭,他说是放不下那些无辜被害者和他们家人的期待。但这也是王卫国为了结案不惜刑讯逼供的理由,不是崔寻独有的。崔寻自述六岁没了母亲,为《可爱的中国》而感动,意识到“人,得懂得感恩。”但血缘意义上“母亲”的丧失,并不必然引起对抽象“母亲”的依恋。

这份贯穿半生的动力,是某种隐秘的心理诉求吗?电影中反复插入一组镜头:童年崔寻在玉米地里追着一个女子叫“妈妈”,女子却突然消失不见。影片结尾处,老年崔寻给自己一生的“寻找”做了总结:“哪有什么答案?咱们就一直继续找下去吧。”这句话很玄虚。“一直找”仿佛对应着他穷尽一生追查真相的职业追求,可“没有什么答案”,又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这份追寻的意义。一位本该凭借丰富阅历和深邃内心打动观众的鲜活形象,最终成为一个扁平的“刑侦专家”符号。

反之,那个问出“你的坚持源于什么”的王卫国,却显得更加真实可信,也更发人深省。他正直守信,却始终带着几分江湖气和世俗味。他重人情世故,在意自己的现实利益。坚守正义却牺牲了仕途,他心灰意冷,最终为了女儿走上了经济犯罪的道路。这个形象很容易让人想起电影《八仙》当中的钟离权。

王卫国与钟离权的命运,提出了严肃的追问:那些让人在逆境中坚持下去的信念,究竟从哪里来?遗憾的是,在《神探之痕迹》当中,没有提供答案。